依我的判断，若想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化”问题，关键之处即在天水一朝。宋代是中国历史至为重要的转捩点，中华文明“古典”（这是类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概念）文化在宋代到达了顶峰，这是自先秦以来前所未有的思想自由激荡的时期，而随着宋朝的败亡，以消极、保守为特点的新的文化“传统”在明朝成形，中国开始进入其精神与文化上的消沉期。如果宋代较之前各时期的发展仅是像唐代比之汉代那样，则不能说赵宋一朝的创造与“现代化”有特别大的关系，宋的特殊，即在其前所未见的“近代性”。虽然“唐宋变革论”者已注意到了宋代与唐代之间巨大的差异，并看到了宋代所具有的许多“近代”特征，受西方近代历史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将宋代视为近代的开端。但“唐宋变革论”却无法解释，为何许多“现代性”的现象只为宋代所有，全不见于后来的明、清。

这里需要比照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方才更容易看清。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为一个并不确切但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标志着西方古典时代的终结（这里不算阿拉伯世界），而填充在古典与近代之间的，是近一千年的中世纪。中世纪的早期，许多文明成果（包括哲学、科技、经济、制度、文化上的）在西欧的民众的生活领域消失，西方世界遭遇了严重的衰退。到了中世纪的中后阶段（约1050年以后），随着生产力、贸易的逐步复苏，古典时代的文明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之后科学的“发现”与重大的进展，使一切变得不同，近代开始了。

宋代是中国“古典”时代的最后时期，与西方所不同的是，宋代同时展现出来的“近代性”比西方文艺复兴以前的任何历史阶段都要显著，但也显然，宋代的“近代化”（这并不是说宋代的知识阶层已有了现代式的“进化”观念，而是宋朝所做出的种种独创性的努力，使得宋代的中国文化比任何时候都接近“近代”的概念）的努力失败了，中国也迎来了她的“黑暗时期”。现今，学界对于宋朝的理解与研究仍极其不足，余英时的这本著作对宋代的政治文化提供了富有创见与启迪性的观察，但许多重要的问题，尚未有后继者。理解了中华文明曾发展到怎样的高度，又是因何而陷入沉寂，进一步才有恢复的可能。在作者深刻的洞察之上，这里对部分的问题做出一些初步的思考。

1. 回向“三代”

由于此时尚没有任何“近代化”的先例可循，宋朝的中国知识阶层当然不会也不能提出一个还不存在的“近代化”作为目标，但我们仍可以通过另一现象，清楚地看到宋代的确存在着革新的思潮。在中国古代的传统里，夏商周所谓“三代”被包括儒家在内的学者视为最理想的、道统与治统合而为一的时代，以今人的眼光，这一判断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远没有充分证据的，甚至“三代”具体的社会情形如何，都含糊不明，难以搞清。如此也使得回向“三代”，这一在仁宗朝开始在朝野中产生重大号召力的理想，在实践上指向了对新的政治形态、思想文化的创造，“法其意”而不拘于单纯的“复古”是回向“三代”的真精神所在，可以比之于“文艺复兴”的精神理念。北宋的两次变法运动，无疑都是这一思潮在政治领域的具体实践，如果仅将变法视为应对时局之举，则不足以揭露其有别于其他改革运动的特点。回向“三代”的口号清楚地指出了一种“托古改制”式的对进步、超越的要求，是为宋代的基本特征。

1. 士大夫

提出并着手实施回向“三代”理念的主体是士大夫，即这一时期中国的知识阶层。即使不与西方文化语境下的“知识分子”群体做横向上的比较，天水一朝的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独特的，不仅明清时期的士大夫无法望其项背，汉唐时代也不能相比。在宋代士大夫的身上，“以天下为己任”的共识不仅体现着士大夫的责任意识，亦是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主体意识。皇帝仍然握有最终的大权，但却不能独占权力（不仅指作为个人的“皇帝”，而是指作为制度的“皇帝”），宋代的思想家们从文字与行动中流露出明显的约束君权，将实权归于士大夫的“虚君”思想，士大夫持“道”或“义”为出处的最高原则成为一种风尚，皇帝也视这种“共治”为当然。这与东晋时期门阀大族与司马皇室“共治”的情形不同，士大夫是一个自由流动的阶层（这一点在古代世界的确莫有可比），更多彰显的是“知识”而非世袭身份的力量。宏观来看，权力与责任相伴而生，作为一个群体的“士”阶层，其责任与权力大致是在动态平衡中相匹配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光有制度或思想层面的进展不足以支撑起社会整体的进步。甚至从长时间的演化来看，单单如此，这点发展都会丧失。

三、“国是”

作者特别注意到，宋代的“国是”观念这一中国政治文化史中前无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独特现象。“国是”在宋朝是一个法度化的观念，自熙宁变法开始出现，并成为之后有宋一代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的重要形成部分。“国是”由皇帝与士大夫（主要是执政的宰辅）商议而定，其性质类似于现代政治概念中的“基本国策”，一旦订立，皇帝和执政大臣皆不得公然违背。政治路线上的斗争围绕着“国是”开展，没有“国是”的支持，就没有政治上的合法性。皇帝的角色从唯一的决策者（传统上宰相名义上只有建议的权力，决定权在皇帝）变成了参与者之一，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宋代“士”阶层与皇权的共治。

1. 哲学

革新的思潮呼唤着新的哲学，新的哲学影响着进一步的发展。这里的哲学取其广义，并不专指形上学。哲学上，在宋朝最有影响力的是理学（或者说“道学”概指程朱理学与心学）与王安石的“新学”。可惜的是，由于史料的遗失，王氏“新学”的全貌我们如今是无从了解，但可从仅存的间接资料中，略窥其意旨。大致来看，王安石在基本的儒家立场之上，对于佛经以及诸子百家都尽量吸收，不在儒释道之间建筑壁垒。就最终的目的而言，“新学”与理学都致力于改革社会，建立新的秩序，王安石与理学家们都认为，惟有“内圣”才能“外王”。但理学家们并不认可“新学”关于内圣的观点，且认为这就是熙宁变法失败的症结所在。二程的“理学”在与“新学”的思想对抗中逐渐成型，在理学家看来，需先做好“内圣”的功夫，才能真正实现“外王”的目的。因而理学家们沉潜于“内圣外王之道”，为秩序的重建做更长远的准备。当代的研究者在讨论理学时常常只关注于其“形上学”而完全忽视了与实际政治之间的关系，这是从西方式的视角对中国文化特征的误解。作者关于理学产生的影响的论述到朱熹离世为止，这留下了重大的难题，明清皆奉程朱理学为官方的唯一正统，理学家们的尝试固然是不成功的（没有实现建立“三代”般的秩序），但他们毕竟终身以进步和革新为标的，何以他们的思想竟在思想禁锢甚而倒退的明清时期成为官方正朔？明清思想领域的状况与理学之间的具体逻辑关系是怎样的？这是否又是一个基督之于中世纪，马克思之于苏联般的错误？这就要留待之后的研究了。

1. 结语

虽然宋朝的中国曾达到了如此的文明，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为人所共知的，甚至最后是一场巨大的失败，灾难性的后果绵延至今尚未恢复，这也是为何人们如今对宋朝如此“陌生”。那么，问题出在哪呢。还是来比较一下西方的境遇吧，欧洲关于“近代”化的尝试比宋朝晚不到三四百年间，其发生的形式更为松散而无统一，恰也是由于力不往一处使，则一两次的失败倒也无妨。最终“近代”真正的关键之处，或许还是在于科学的力量得到发现，这是令“近代”全然不同于“古代”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文化那绵延不断的整体性，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过也是，东西方的发展总是不太同步，先进者为后进者的养分与借鉴，后来者也接力前进的前锋，这大概是历史的螺旋发展的一例了。